

“思”辨

——身体思维的内在机制分析

唐涛,张之沧

[摘要] 我们不应把“思”仅仅归功于大脑,而忽视整个身体对思维的作用。思维不是一种独立于身体活动的先验逻辑能力或纯粹的主观意识,而是在有机体能够寻求和处理世界的信息时就已经具备的一种功能,一种根植于身体场的生成性活动。身体是积累和储存人类经验、知识和智慧的信息库,是持续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和能量交换的身体场,它孕育和催生着所有形式的思维。正是独特的身体结构、生存意向、生命冲动、感知能力、好奇心、求知欲、想象力、意志力、直觉、多层次的意识结构、灵活的实践能力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共生性等共同构成了“思”的源泉。

[关键词] 身体场;身体思维;意识阈

[作者简介] 唐涛,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张之沧,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97

[中图分类号] B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08)01-0005-06

与形而上学的身心分裂、脑体分裂的观点不同,我们认为一切“思”都源自整体性存在于世的身体。身体不但是积累和储存人类经验、认知图式和知识型的信息库,也是产生、发展和更新人类实践经验、思维方式和创新能力的动力场。正是具有物质结构、心灵结构以及与周围环境产生共生性的身体场蕴藏着人类“思”的一切秘密。显然,这里似乎触犯了有关思维的三个常识性的观点:思维是超逾自然之外的心灵活动,与自然态的肉体无关;思维是由人脑发挥作用的认知功能,与躯体无关;思维是有意识的认识活动,与无意识的身体无关。下面我们就借助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展开对身体思维内在机制的分析。

一、身体思维的生成性

从传统形而上学二元论的视角看,心灵与身体是两极对立的一对范畴。正如人与自然、理智与激情、在场与不在场、存在与虚无、真理与谬误、自为与自在、秩序与混乱、主体与客体一样。而这些对子之中,前者往往被赋予至高的优越性,它是对后者的控制和超越。正是在这种灵与肉、脑与体的分割术下,思维与身体之间本源性的联系被斩断了。身体被看作是一个自然、机械和被动的“臭皮囊”,是“空间上并列的各个器官的组合”;而思维则被看作是大脑所具有的一种超逾于自然、独立于身体的高级理性活动。如果跳出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我们禁不住要追问:思维就等同于理

性认识吗,理性超逾于自然之外吗?思维的器官大脑就等同于思维主体吗?还有,思维天然地就是有意识的活动吗?

要解开这些困惑,我们首先要重新审视这具被残忍地“脑体分家”的身体。事实上,正如梅洛-庞蒂所言,人的在世存在(*being in a world*)是一种身体性的在世。身体是由物质结构(肉体)、精神结构(心灵)和交往结构(世界)三者构成的一个相互蕴涵、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大系统。其中,身体的物质结构不仅仅指躯体,还包括身体形态、感知-运动系统、大脑-神经系统、生命冲动及本能等;精神结构不仅指意识、理性,还包括情感、情绪、意志、信念、想象、直觉、求知欲、深层意识以及精神需求、生命体验等复杂的心灵世界;而身体的交往结构则动态地表达了身体与社会、文化、历史、他者的关系,包含着多样的行为方式、灵活的交往方式、复杂的语言系统以及多层次的意义系统等。可以说,肉体、心灵和世界,它们在每一次现实的欲求、选择和行动之中彼此拥有、互相促生、辩证统一,它们动态地交错融合呈现为共同发挥作用的场。我们就扎根于这个“身体场”(body field)^{[1](P112)},这是我们将与世界相接触的实在界面。因而,作为具有独特蕴涵结构的整体性的身体绝不仅仅是单纯的、被特定化的生物机体,更不是一般物理学意义上的物体,而是与环境接触、互相作用,进行信息交流并完成种种行为和思维活动的“活的身体”(lived

body)。

思维正是“活的身体”在与世界永无止境的互动和创生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能力。换言之,思维不是超逾于自然之外的神秘能力,而根植于一个包含着自然、心灵和文化等丰富内容的具体存在的身体场内;它伴随着身体的求生活活动生成,并将持续进化下去。认知主义(cognitivism)认为,思维早已发展到了高级的符号语义阶段。人的大脑高度精密发展为思维摆脱自然的束缚准备了一个内在的、想像的空间,思维不必再局限于实际的时空、情境和实际的对象交往中,而成为单纯地处理心理表征的过程。当然,从神话思维、宗教思维到科学思维,从古代的原子论、整体论,近代的归纳论、演绎论,一直到19世纪的实证论、逻辑论、辩证法和实用论,都证明人类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方法在不断地发展。但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思维就此获得本体论意义上的自足性,或者是脱离身体场而存在的实在独立性。相反,我们认为认知主义过于孤立地看待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而无视它的起源及演化。

如果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动物、理性与非理性、思与非思之间的连续性的角度看待思维,我们会发现:思维既存在于理性认识中,也存在于感知、想象和直觉之中;既存在于概念、命题、符号系统及其逻辑地运作中,也存在于肌体、心智的运作以及生命的体验之中。当动物能够辨识和利用周边环境的信息,而不是完全被动地存在着,就显露出思维的迹象。譬如一只角鹿为了躲避鳄鱼的袭击而小心地测度饮水的合适位置,这与一个人对周边发生之事作出警惕的观察、判断极为相似。可以说,在人的意向性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机警,正是原始组织对周围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的生存斗争在进化的高级阶段上的显示。正如当代心灵哲学家塞尔(John Searle)所指出的:“人类和其他高等动物也像其他有机体一样,都是生物种类的一部分。……这些动物的特殊生物属性,譬如拥有丰富的意识系统以及高等智能,语言能力,能够非常精细地感知分辨,理性思考的能力等等——都是生物现象。”^{[2](P90)}这里,塞尔将意识、智能等看作是“生物现象”并非是要将人简单等同于其他动物,而是要祛除理性超逾于自然之外的神秘色彩,这个“自然”既指外部世界的大自然,也是指身体包含的自然属性。美国加州大学语言学家Lakoff等人更是明确指出:“理性是进化的。抽象的理性建立于‘低等’动物也具有的知觉和运动推理形式的基础上。这个结论是理性的达尔文主义,一个合理性

的达尔文主义:理性,即便是其最抽象的形式,也是使用而不是超越我们的动物本性。理性是进化的这个发现完全改变了我们与其他动物的关系,而且改变了我们关于人是唯一的理性存在的观念。理性并不是一个将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的本质,更确切地说,是它将我们置于一个与动物的连续统一(continuum)之中。”^{[3](P4)}

简言之,思维并非是人类那精密的大脑近期才有的能力,而是在有机体能够寻求和处理世界的信息时就已经具备的一种功能;它先于人类的其他动物的生存活动中就显露端倪,先于“思”的“非思”之处便被孕育了。这里,强调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动物、思维与本性之间的连续性是为了展现它们之间被二元对立思维抹杀的相承关系,而非否定它们之间的超越性。事实上,思维作为一种生物连续进化过程中功能性、生成性的活动从一开始便根植于与外部世界发生作用的身体场之中。一旦离开身体场,思维就因为与其动力系统、知觉系统、调节系统以及外界的能量转化系统的分离,而犹如去皮之毛,无从依附。同样,身体也不能离开思维而独自进行漫漫生存之旅。“思”伴随着身体的生存意向性而存在,它贯穿实践活动始终。因而,我们完全可以大胆设想和逐步论证,正是因为有高昂的头颅、灵活的四肢、贪婪的胃口、发达的感知-运动系统、大脑-神经系统、丰富的情感、顽强的意志力、无限的想象、求知的欲望、不可遏止的好奇心、滔滔不绝的表达欲、过滤信息的感官阈、超逾束缚的激情、追求自由的冲动、面对未知的焦虑、面对选择的彷徨等等才会有所“思”、有所“想”,能够“思”、能够“想”。它们一起构成了思维的源泉和推动其不断演进的动力机制。从这个角度说,“思”即身体思维,即梅洛-庞蒂所说的“内在于知觉的无限思维”^{[1](P66)}。

二、身体思维的动力源

将“思”完全归功于人脑,是“脑体分割术”犯下的第二个错误,即将思维的器官直接等同于思维的主体。从思维发生和进化的角度看,无论是动物萌芽状态的思维、原初人类的行动思维还是现代人的高级的科学思维,思维器官“脑”都非但不是独立发挥作用,而且其本身就是生命进化中机体的感知-运动系统、大脑-神经系统功能逐步强化的体现。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将思维仅仅看作是大脑单独的活动和功能,这种强硬的物理主义不但容易走向极端,譬如干脆取消了心灵状态和心理现象的存

在(取消主义, Elim inative Materialism), 或者将思维仅仅看作是大脑执行信息输入和输出的功能(计算功能主义, Computational Functionalism), 而且很难有效地解释思维进化的动力机制。因为篇幅的原因, 这里我们暂不讨论取消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思维观, 只分析从身体思维的观点如何看待思维的不断进化。

“认知系统并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大脑; 进一步说, 由于神经系统、身体和环境是不断变化和相互作用的, 真正的认知系统也就是包含三者的一个统一系统。”^{[4](P345)} 这个“统一系统”正是指根植于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之中, 浸泡于自然进化和历史文化的长河之中的整体性的身体。思维植根于在世生存的身体之中, 而“生命在于两类原因: 一是生命遇到无机物质的抗力, 二是生命自身包含的爆炸力——取决于倾向的不稳定的平衡”^{[5](P86)}。这两种生命需求决定了思维的使命, 同时, 彼此的张力又通过作用于身体场而不断推动着思维演进。

首先, 思维是由生命在确定的环境下为了作用于所接触的事物而被创造出来的。它旨在通过把握外部事物的特性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来引导人的行为, 使人能预先或及时判断特定情景从而保证身体更好地适应其所处的环境。因而, 思维最常见的作用即在一种情景中过滤出与已经经验和已知的东西相近之物, 尽可能地排斥不可把握的独特性、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 从而建构起稳定的秩序和基本的认知图式。思维的这种平衡和整合功能在基本的感知活动中有明确的体现。譬如注视活动。“看”绝不是一种被动接受外部信息的过程, 即先有各部分感觉, 然后将这些感觉拼加在一起凑成一个印象的过程, 而是一种身体知觉直接地、同时性地、积极地组织信息的“完形”(formation)过程。格式塔心理学家发现, 视觉的组织活动不但受到刺激物的制约还受到人内在的“完形压强”的作用。很多情况下, 刺激物本身的倾向并不呈现为某种结构, 这时观看者的身体知觉表现出一种改变刺激物的强烈趋势: 一方面放大、扩展那些适宜的特征, 一方面取消和忽视那些妨碍其成为一个简约结构的特征。譬如一个成 85 度或 95 度的角, 其多于或少于直角的那 5 度就会被忽略不计, 从而被看成一个直角; 轮廓线上有中断或缺口的图形, 往往自动地被补足而成为一个完整连续的整体。在格式塔心理学中, 这种趋势被解释成身体知觉的一种能动地自我调节的倾向, 即身体总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内在平衡。无论视觉区域还是它们在大脑中的视觉投

射区域, 本质上都是“能”的区域, 都符合这种“能”的追求平衡的特性。思维这一功能发挥出的作用表现在身体的方方面面, 譬如感知觉的统合、运动的平衡性、行为的惯性、情绪的平静、某种逻辑轨道的完满、社会交往的和谐、甚至“天人合一”的精神共鸣……都会因此而获得某种由紧张到松弛的愉悦和舒适感, 这是一种因消除了物质的抵抗力、清除了不可预见性和陌生性的生命快感。

然而, 如果身体场内的另一种力量——打破平衡的爆炸力——足够强大的话, 又会使我们感到由机械性、惯性带来的厌倦, 从而产生打破原初结构、固有模式的新“思”。可以说, 这种在物理秩序的必然性中加入不确定性的冲动是生命的另一个本质性力量。这也就是柏格森曾指出的: “生命冲动在于一种创造的需要。生命冲动不能绝对地进行创造, 因为它面对的是物质, 也就是与自身相反的运动, 但是, 生命冲动获得了作为必然性的物质, 力图把尽可能多的不确定和自由引入物质。”^{[5](P209)} 这种从适应到改变物理秩序的努力是在生命体的存在方式、获取信息的方式的演进中不断发展起来。植物本身是不移动的, 它接受的都是均匀分布的信息, 比如光、水、溶解于水中的营养物, 这使得植物系统消除物质的抵抗力几乎都是单一负反馈式的、定向的、稳定的。动物则具有移动的活动方式和有基本分工的身体结构, 在对离散的信息和能量进行捕捉、吸收的过程中发生了较高的反映形式, 即表现为与感觉、知觉、思维相联系的神经活动。而人类不但拥有分工细致的身体构造、灵活的运动方式, 更有复杂的对象性活动、社会化的生产和交往方式, 相对充足的物质条件、处理繁多信息的能力、因摆脱基本生存需要而能够从事思考和创作的时间, 这一切都使得人类能够以更加自觉、主动和有效的方式作用于物理秩序。

正因为如此, 生命哲学家们以及所有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都对这种“身体内在的打破平衡的爆炸力”怀有特殊的情结。尼采更是将这种不断冲撞的力上升到人的本质的高度。他将人称作“未定型的动物”, 认为人具有不受限制的可塑性, 人必须在生命的跋涉中不断地生成自己、创造自己。与其说是创造, 不如说是意志面对障碍、束缚时的强力, 它使得人是“以自己作试验的伟大的试验者, 不满足, 不厌倦, 为最终的统治而与动物、自然和诸神斗争; 他还是大无畏的永恒的未来, 他找到了自己不停地跳动着的力量, 因而他的未来像马刺一样, 无情地刺进每一个现存的肉体”^{[6](P198)}。公正地说, 正

是这种不断地上进、突破、冲撞的生命力,不断追求自我更新和创造新事物的冲动,使得人类的思维和存在保持开放、前进的状态,不断超越旧的思维模式、僵化的意识形态、惰性的行为方式以及陈腐的社会结构。从这个角度看来,20世纪后半叶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认识论上对表征主义、基础主义、纵向等级思维、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对直觉、灵感、顿悟、想象的强调,在方法论上突出否证论、试错法、反归纳主义、多元方法论、游戏思维、发散式思维等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因而,从思维进化角度看,思维决不是孤零零的大脑在执行信息输入输出功能时的产物,或者千年不变的先验的逻辑能力。而是在身体场内这两股生命力的在特定情景中不断推动着进行建构与超越的活动。可见,要理解“思”就不能不理解身体内蕴藏着的看似矛盾的渴望。它既需要已知带来的安全感,也对未知充满了好奇心;既需要由必然性带来的有条不紊,也渴望偶然性带来的惊心动魄;既需要阳光普照带来的清晰明了,也会对神秘星空产生无限遐想和神往;它既对大自然有着家般的依赖感和对神般的虔诚感,同时也对其充满了无尽的征服欲……可以说,正是因为身体场内这两股力量的冲突和动态平衡,才有了思维活动中概念的凝结与更新、体系的建构与解构、思维模式的定型与转变;以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逻辑与非逻辑、意识与无意识、思与反思等辩证的思维环节的运动。

三、身体思维的意识阈

面对脑与体、灵与肉二元分裂的思维观,我们还需要追问:“思维天然地就是有意识的活动吗?据这种思维观之见,思维一定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处理信息的活动,通过超越经验的反思或者科学的实验就能被我们完全知晓,因而,所谓肉身的“思”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其实,思维发生学早就告诉我们,思维不仅存在于人的有意识的认识活动之中,也存在于人的无目的、无意识的活动之中。例如原始人的“野性的思维”,婴儿的思维,人做梦时的下意识活动等等。而最新的认知科学也支持了我们的观点,即“思维大都是无意识的”^{[31] (P3)}。

这里首先有必要对“无意识”作出区分:一种是无关意识的无意识,另一种被抵消意识的无意识。两种无意识看上去都等于零,但是,前一个零表示什么都没有,后一个零则表示有两个质量相当、方向相反的力相互抵消。譬如说,一朵凋零的

玫瑰的无意识是一种无关意识的无意识,玫瑰对于自己的凋零毫无感觉可言。而本能的、直觉的、惯性的行动中的无意识与这种情况是不同的。当母亲一边看着电视剧一边机械地编织着毛衣,当依莎多拉·邓肯忘我地滑动着舞步,当梦游者漫无目的地走出卧室……这些行为显然都是无意识的。但是,这种无意识在于行动等同于行动本身,行动完全融入其表现,以致任何意识不能溢出。换言之,完全自然地实现自己的行为与意识直接抵消了。因此柏格森说,当行为是一种必然时,意识是多余的。身体思维中的“意识多余”并非如一培土、一把刀那样的与意识无关,而是指意识只是以可能性和潜在性状态存在着,一旦行为受到障碍,意识就可能被迫显现。比如说在失眠情况下,平时自然而然的困倦与睡着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身体中仿佛有一股异己的力量使人兴奋使人无法安眠,这时心跳的节奏、眼皮的沉重、呼吸的节奏,这些往常处于意识阈(threshold of consciousness)之下的身体活动细节全都跳出来成了意识的对象。换言之,那些在身体的感知和行为中直接得到实现的活动就不会成为“焦点意识”关注的对象。

可以说,在笛卡尔最重视的思维领域,不但我们所选择的思维对象在无意识中很大程度受到深刻的文化、历史以及现实条件的限制,而且完成接触、筛选、处理信息的“我思”活动也并非完全是自觉自控的,而是在我们的意识阈之下悄然进行的。“视觉、听觉、嗅觉、感觉等神经加工过程是不可能被意识到的,大部分推理也不能被意识到。语言的习得也是在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的。”^{[31] (P10-11)}譬如我们每天都在轻松地、流利地讲话,但是规范的语法表达却并不是有意识完成的,张开嘴我们说出一切,浑然天成。也正因为如此,Stewart W. Holmes指出,通过大脑而无意识地起作用的身体智能(bodily mind)较作为身体的一个特殊部分而存在的大脑思维具有更大优势。身体智能往往作为整个身体的控制中心而发挥着作用,它拥有一种我们迄今还不能理解的力量。他分析了细胞和系统杰出的工作,譬如处理食物(消化及泌尿系统)、分配能量(血液循环及呼吸系统)、自觉运动(神经-肌肉及骨骼系统)、抵制外物入侵(皮肤及免疫系统)、维持正常状态(内分泌系统)、对刺激的灵活反应(神经及感觉器官)以及繁衍(生殖系统)等,然后感慨道:“小小的细胞是如何完成这么多任务的呢?对于这一切,我们仅仅处于认识的起点。它们的方式是如此的精巧、具有创造性,如此地奇妙富有智

慧。相比之下,后来被我们发明出来用于‘发明’的心灵则显得笨拙、犹豫。”^{[7] (P13-14)}而身体在学习和运用话语时的智能就更令人惊叹,因为即使一个简单的话语也需要涉及许多认知运作程序和神经加工过程。这个过程如此复杂,而身体却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最少的力完成它。“我们只是在无意识情况下、在运用我们自己的身体时‘不知不觉’地学习我们的自然语言。为了维护我们的身体,我们从环境摄取养分:食物、水、空气、光明、爱。在无意识之间,身体转换这些元素进入我们的血肉、骨骼以及其它所有工作的系统。为了学习语言,身体接受人们说话的声音和符号。同时运用我们的第一位老师——大脑,它储存和整合成千上万比特来自感官的资料。身体智能指导我们的发音肌肉和语音器官,以排列组合我们的话语变成可以被理解的。……离开人世之前,我们几乎从未停止运用语言,可听见或者听不见的语言。时间中的百分之九十九,我们做这些完全是无意识的。我们的大脑几乎是立刻用我们的自然语言将想法编译成码。”^{[7] (P16)}

那么,身体思维如何得以在行为中不知不觉地实现呢?海克尔定律(Haeckel Law)表明,人在其胚胎发展中以逻辑必然性的形式走完了动物到人发展的漫长历史;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揭示,人在12岁以前也以必然性的形式再现了原始人到现代人的思维发展历史。正是我们的身体积累和储存下这些类的经验和智慧,并将之融入知觉和行为中,使它们自然而然地发挥着作用。正因如此,柏格森指出:“大脑的机制就是为了把差不多全部的去压抑到无意识之中,只把能解释目前困境、有助于正在酝酿中的活动、能进行一种有益的工作的东西引入意识之中。”^{[5] (P10)}理性文化使我们相信,我们是在根据理性的安排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事实上,却是身体场内积淀的类的智慧、生命冲动的力量积蓄、潜意识的涌动在暗中筛选着我们的信息、指导着我们的思维、支配着我们的行动。而自觉地、有目的理性思维只是复杂意识系统、身体思维的一种表面运动,是复杂微妙的身体思维大系统向有意识的思维输送了一切自然力量。也正是在对无意识之思的探索冒险中,福柯反对传统的先验意识哲学和主体主义,强调“我思与非思”^{[8] (P420)}的辩证法。他认为,我们必须抛弃笛卡尔的“我思”观念,因为它把人等同于纯粹意识的“绝对透明性”。而事实上,“我思之我”不过是一个有限的主体,“我”沉浸在“非我”之中,沉浸在那束缚我并

且为我那处心积虑的理性所不能控制的“非思”中。譬如非反思性的生活世界和身体智能,譬如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的知识型、概念系统、认知图式、思维框架等。这里,我们所探究的“非思”并非康德意义上的自然彼岸的超越性,也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与自为相对立的自在,而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实在向度,是一直在意识阈之下发挥巨大功能,而又未能被充分理解的“内在于身体的无限的思维”。

因此,从是否有意识作为判断“思”的标准之一是有失偏颇的。“思”是不断从“非思”涌现出来,逐渐进入人的意识聚焦灯之下的。可以说,无论是原始人的混沌思维还是现代人的系统思维;无论是直观行为思维、具体形象思维,还是抽象逻辑思维;无论是古代整体性思维、近代机械思维,还是辩证思维;无论是再现性思维还是创造性思维;无论是视觉思维还是言语思维;无论是线性思维还是立体思维;无论是表象思维还是反思思维;无论是静态思维还是动态思维;无论是归纳思维还是演绎思维;无论是发散性思维还是收敛性思维;无论是想象思维还是求证思维;无论是有意意识的思维还是无意识的思维……一切“思”原本都是身体性的。一切思维的具体样式都是人在特定的对象性活动中身体思维的不断现实化。

结 语

从以上分析可见,如果我们仅仅将思维看作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内在规律的反映,又仅仅将人脑抽离出自然的、历史的、感性的、实践的身体,将导致我们狭隘地将思维当作一种先验的逻辑能力,当作纯粹的主观意识对既定世界的直接表征,或者是孤立的大脑计算机式的信息处理。事实上,离开在世存在之身体,离开身体的独特形态、生理构造、感知-运动系统、知觉阈、大脑进化、完形能力、生活体验、认知结构、实践方式就无法把握思维的产生和演进。也正因为如此,20世纪后半叶,哲学和科学家们开始积极地从有机体进化的角度思考身体蕴藏的认知力和创造力。无论是雷可夫等人对肉身哲学的研究,斯图尔特对生命内在游戏的探寻,还是梅洛-庞蒂对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福柯对疯癫的追究,对医学史、知识型的考察都体现了这一点。当然,以上我们对身体思维的探讨仅仅是一个开始,还有许多意义重大的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比如身体思维的特征、属性,身体思维的動力机制、运作机制、演进机制;以及相关联的身体场、知觉场、现象场、意义场等重要(下转第52页)

人,好之不厌。”^[12](《说剑》)《韩非子》则列举了君王喜好所带来的弊端:“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齐桓公妒外而好内,故竖刁自宫以治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燕子哿好贤,故子之明不受国。”^[11](《二柄》)由此可见,君王喜好对文化传播的示范作用之大。

权力影响下的官方文化传播主要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权威性。由于属于政府发布的信息,具有很强的权威性,老百姓迫于重压而接受;其二,由于文化传播是依赖于行政体系这个网络的,因此传播渠道相对单一、组织性强、传播效率高;其三,在权力主导下的传播,往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和模式,这就致使传播的模式趋于僵化。

在中原文化传播史中,存在着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传播规律,即文化只有符合其政治需要并在国家权力支持下才会发展成为主流文化,因此也被称为“正统文化”。儒家学说命运的变迁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孔子创立学说时处处碰壁,是因为其学说不适合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需要,相反兵家和法家却由于能富国强兵而备受推崇。但到了汉代被统治阶级认识到其政治价值后,儒家著述被列为经典,奉为正统,世代不迁。在传统社会里,文化的民间

传播发挥着“在下美俗”的作用。文化的民间传播大多属于人际传播范畴。传统社会,由于交通工具和通讯方式的落后,人们的社会流动性不大。大多数传播活动是通过人际关系来实现的。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主要有家庭关系、乡里关系、师生关系、同僚或同仁关系、临时结成的人际关系等等。由于文化的民间传播传播的往往也是正统文化,因此它是官方传播的重要补充。

[参考文献]

- [1] 论语[M]. 诸子集成,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 [2] 孟子[M]. 诸子集成,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 [3] 王保国. 评荀子的君本论及其君民“舟水”关系说[J]. 史学月刊, 2004 (11).
- [4] 荀子[M]. 诸子集成,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 [5] 新书[M]. 文渊阁四库全书.
- [6] 春秋繁露[M]. 文渊阁四库全书.
- [7]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8] 孙旭培. 华夏传播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 [9] 尚书[M]. 十三经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0] 管子[M]. 诸子集成,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 [11] 韩非子[M]. 诸子集成,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 [12] 庄子[M]. 诸子集成,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责任编辑: 青山]

(上接第9页)范畴的解释; 身体思维与身心关系、具体思维形式与特定存在状态之间的关系; 身体思维在形成范畴、提炼概念、作出分类、运用语言、把握关系、进行推理过程中的作用方式; 身体思维在应对自然秩序、社会秩序及心灵秩序不同领域难题中应当发展出的不同的具体思维样态等问题的研究。我们相信, 对于身体思维的探索是极具价值的, 作为以反思性为思维方式的哲学, 要对“思”本身做出进一步的追问, 要激发思维的创造性, 就应当先从经验意识返回到身体知觉, 从理念世界返回到生活世界, 从孤立的大脑返回到包括大脑器官在内的整体性的身体。

[参考文献]

- [1]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62

- [2] John R. Searle. The Rediscovery of the Mind [M]. Cambridge/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92
- [3] Lakoff G., & Johnson 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4] Gelder E. What Might Cognition Be, If Not Computation? [J]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92 (7).
- [5] 柏格森. 创造进化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6] 米切尔·兰德曼. 哲学人类学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6
- [7] Stewart W Holmes. The inner game of life [J]. Et Cetera (ETC), Spring 2002, 59, 1.
- [8] 米歇尔·福柯. 词与物: 人文科学考古学 [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2

[责任编辑: 青山]